

梁启超评传

沈大德 吴廷嘉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O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國學大師叢書

趙林初題



梁启超评传

沈大德 吴廷嘉 /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國學大師叢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梁启超评传 / 沈大德, 吴廷嘉著. --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4.12

(国学大师丛书)

ISBN 978-7-5500-1180-9

I . ①梁… II . ①沈… ②吴… III. ①梁启超 (1873 ~ 1929) - 评传 IV. ①
B25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83407号

梁启超评传

沈大德 吴廷嘉 著

出版人 姚雪雪
统 筹 毛军英
责任编辑 张 越
书籍设计 方 方
制 作 周璐敏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9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 × 1168mm 1/16 印张 11.75
版 次 1996年12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2版
2015年3月第2次印刷
字 数 168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1180-9
定 价 19.50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4-297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国学大师丛书》编辑委员会

《国学大师丛书》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永兴	石 峻	任继愈	刘桂生	汤一介
阴法鲁	张岱年	季羡林	周一良	庞朴
赵朴初	姜义华	龚书铎	戴文藻	戴 逸

组织编辑委员会成员：

桂晚风	熊向东	刘国藏	邓光东	周榕芳
朱焕添	王志斋	范卫平	关小群	钱 宏
彭开天	傅伟中	李晃生	朱光甫	毛军英
尹飞舟	赵焜森	刘义林	董士伟	王守常
方 鸣	钱文忠	傅修延	陈 晋	宋志明
景海峰	赵丽雅	李晓岗	陈 娟	黄卓越
陈骏涛	刘 焰	魏漫伦	刘庆生	

丛书封面题签 赵朴初
丛书总体编辑 钱 宏
丛书肖像木刻 颜 仲

总序

张岱年

中华学术，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呈现了学术思想的高度繁荣。两汉时代，经学成为正统；魏晋之世，玄学称盛；隋唐时代，儒释道三教并尊；到宋代而理学兴起；迨及清世，朴学蔚为主流。各个时代的学术各有特色。综观周秦以来至于近代，可以说有三次思想活跃的时期。第一次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竞胜。第二次为北宋时代，张程关洛之学、荆公新学、苏氏蜀学，同时并兴，理论思维达到新的高度。第三次为近代时期，晚清以来，中国遭受列强的凌侵，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于是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殚精积思，探索救亡之道，各自立说，期于救国，形成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

试观中国近代的学风，有一显著的倾向，即融会中西。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对于中国学人影响渐深。深识之士，莫不资西学以立论。初期或止于浅尝，渐进乃达于深解。同时这些学者又具有深厚的旧学根基，有较高的鉴别能力，故能在传统学术的基础之上汲取西方的智慧，从而达到较高的成就。

试以梁任公（启超）、章太炎（炳麟）、王静安（国维）、陈寅恪四家为例，说明中国近代学术融会中西的学风。梁任公先生尝评论自己的学术云：“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



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根深蒂固，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薄，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清代学术概论》）所谓“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正表现了融合中西的倾向，不过梁氏对西学的了解不够深切而已。梁氏自称“适成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这未免过谦，事实上梁氏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启蒙思想家，诚如他自己所说“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梁氏虽未能提出自己的学说体系，但其影响是深巨的。他的许多学术史著作今日读之仍能受益。

章太炎先生在《荌汉微言》中自述思想变迁之迹说：“少时治经，谨守朴学……及囚系上海，三岁不覩，专修慈氏世亲之书……乃达大乘深趣……既出狱，东走日本，尽瘁光复之业，鞅掌余间，旁览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割制大理，莫不孙顺。”这是讲他兼明华梵以及西哲之说。有清一代，汉宋之学争论不休，章氏加以评论云：“世故有疏通知远、好为玄谈者，亦有言理密察、实事求是者，及夫主静主敬、皆足澄心……苟外能利物，内以遣忧，亦各从其志尔！汉宋争执，焉用调人？喻以四民各勤其业，瑕衅何为而不息乎？”这是表示，章氏之学已超越了汉学和宋学了。太炎更自赞云：“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秦汉以来，依违于彼是之间，局促于一曲之内，盖未尝睹是也。乃若昔人所谓专志精微，反致陆沉；穷研训诂，遂成无用者，余虽无腆，固足以雪斯耻。”太炎自负甚高，梁任公引此曾加评论云：“其所自述，殆非溢美。”章氏博通华梵及西哲之书，可谓超越前哲，但在哲学上建树亦不甚高，晚岁又回到朴学的道路上了。

王静安先生早年研习西方哲学美学，深造有得，用西方美学的观点考察中国文学，独辟蹊径，达到空前的成就。中年以后，专治经史，对于殷墟甲骨研究深细，发明了“二重证据法”，以出土文物与古代史传相互参证，达到了精确的论断，澄清了殷周史的许多问题。静安虽以遗老自居，但治学方法却完

全是近代的科学方法，因而取得卓越的学术成就，受到学术界的广泛称赞。

陈寅恪先生博通多国的语言文字，以外文资料与中土旧籍相参证，多所创获。陈氏对于思想史更有深切的睿见，他在对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中论儒佛思想云：“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在吾国思想史上……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实在是精辟之论，发人深思。陈氏自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但是他的学术成就确实达到了时代的高度。

此外，如胡适之在文化问题上倾向于“全盘西化论”，而在整理国故方面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冯友兰先生既对于中国哲学史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又于40年代所著《贞元六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融会中西的哲学体系，晚年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表现了热爱真理的哲人风度。

胡适之欣赏龚定庵的诗句：“但开风气不为师。”熊十力先生则以师道自居。熊氏戛戛独造，自成一家之言，赞扬辩证法，但不肯接受唯物论。冯友兰早年拟接续程朱之说，晚岁归依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这些大师都表现了各自的特点。这正是学术繁荣，思想活跃的表现。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有鉴于中国近现代国学大师辈出，群星灿烂，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第三次思想活跃的时代，决定编印《国学大师丛书》，以表现近代中西文明冲撞交融的繁盛景况，以表现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的丰富内容，试图评述近现代著名学者的生平及其学术贡献，凡在文史哲任一领域开风气之先者皆可入选。规模宏大，意义深远。编辑部同志建议我写一篇总序，于是略述中国近现代学术的特点，供读者参考。

1992年元月，序于北京大学

重写近代诸子春秋

《国学大师丛书》在各方面的关怀和支持下，就要陆续与海内外读者见面了。

当丛书组编伊始（1990年冬）便有不少朋友一再询问：为什么要组编这套丛书？该丛书的学术意义何在？按过去理解，“国学”是一个很窄的概念，你们对它有何新解？“国学大师”又如何划分？……作为组织编辑者，这些问题无疑是必须回答的。当然，回答可以是不完备的，但应该是明确的。现谨在此聊备一说，以就其事，兼谢诸友。

一、一种阐述：诸子百家三代说

中华学术，博大精深；中华学子，向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精神著称于世。在源远流长的中国学术文化史上，出现过三个广开风气、大师群起的“诸子百家时代”。

第一个诸子百家时代，出现在先秦时期。那时，中华本土文化历经两千余年的演进，已渐趋成熟，老庄、孔孟、杨墨、孙韩……卓然颖出，共同为中华学术奠定了长足发展的基脉。此后的千余年间，汉儒乖僻、佛入中土、道教蘖生，中华学术于发展中渐显杂陈。宋明时期，程朱、陆王……排汉儒之乖、融佛道之粹、倡先秦之脉、兴义理心性之学，于是，诸子百家时代再现。降及近代，西学东渐，中华学术周遭冲击，文

化基脉遇空前挑战。然于险象环生之际，又一批中华学子，本其良知、素养，关注文化、世运，而攘臂前行，以其生命践信。正所谓“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康有为、章太炎、严复、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鲁迅、黄侃、陈寅恪、钱穆、冯友兰……他们振民族之睿智，汲异域之精华，在文、史、哲领域筚路蓝缕，于会通和合中广立范式，重开新风而成绩斐然。第三个诸子百家时代遂傲然世出！

《国学大师丛书》组编者基于此，意在整体地重现“第三个诸子百家时代”之盛况，为“第三代”中华学子作人传、立学案。丛书所选对象，皆为海内外公认的学术大师，他们对经、史、子、集博学宏通，但治学之法已有创新；他们的西学造诣令人仰止，但立术之本在我中华从而广开现代风气之先。他们各具鲜明的学术个性、独具魅力的人品文章，皆为不同学科的宗师（既为“经”师，又为人师），但无疑地，他们的思想认识和学术理论又具有其时代的共性。以往有过一些对他们进行个案或专题研究的书籍面世，但从没有对他们及其业绩进行过集中的、整体的研究和整理，尤其未把他们作为一代学术宗师的群体（作为一个“大师群”）进行研究和整理。这批学术大师多已作古，其学术时代也成过去，但他们的成就惠及当今而远未过时。甚至，他们的一些学术思想，我们至今仍未达其深度，某些理论我们竟会觉得陌生。正如第一代、第二代“诸子百家”一样，他们已是中华学术文化传统的一部分，研究他们，也就是研究中国文化本身。

对于“第三代诸子百家”及其学术成就的研究整理，我们恐怕还不能说已经充分展开。《国学大师丛书》的组织编辑，是一种尝试。

二、一种观念：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

纵观历史，悉察中外，大凡学术的进步不能离开本土文化基脉。但每一代后起学子所面临的问题殊异，他们势必要或假古人以立言、或赋新思于旧事，以便建构出无愧于自己时代的学术。这正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精神在每一代学子身上的最好体现。以上“三代”百家诸子，莫不如是。《国学大师丛书》所沿用之“国学”概念，亦当“赋新思于旧事”而涵注现时代之新义。



梁启超
评传

明末清初，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颜（元）四杰继起，矫道统，斥宋儒，首倡“回到汉代”，以表其“实学实行实用之天下”的朴学学风，有清一代，学界遂始认“汉学”为地道之国学。以今言之，此仅限“国学”于方法论，即将“国学”一词限于文字释义（以训诂、考据释古文献之义）之范畴。

《国学大师丛书》的组编者以为，所谓国学就其内容而言，系指近代中学与西学接触后之中国学术，此其一；其次，既是中国学术便只限于中国学子所为；再次，既是中国学子所为之中国学术，其方式方法就不仅仅限于文字（考据）释义，义理（哲学）释义便也是题中应有之义。综合起来，今之所谓国学，起码应拓宽为：近代中国学子用考据和义理之法研究中国古代文献之学术。这些文献，按清代《四库全书总目》的划分，为经、史、子、集四部。经部为经学（即“六经”，实只五经）及文字训诂学；史部为史志及地理志；子部为诸子及兵、医、农、历算、技艺、小说以及佛、道典籍；集部为诗、文。由此视之，所谓“国学家”当是通才。而经史子集会通和合、造诣精深者，则可称为大师，即“国学大师”。

但是，以上所述仍嫌遗漏太多，而且与近现代学术文化史实不相吻合。国学，既是“与西学接触后的中国学术”，那么，这国学在内涵上就不可能，也不必限于纯之又纯的中国本土文化范围。尤其在学术思想、学术理论的建构方式上，第三代百家诸子中那些学贯中西的大师们，事实上都借用了西学，特别是逻辑分析和推理，以及与考据学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实证方法，还有实验方法、历史方法，乃至考古手段……而这些学术巨子和合中西之目的，又多半是“赋新思于旧事”，旨在建构新的学术思想体系，创立新的学术范式。正是他们，完成了中国学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我们今天使用语言的方式、思考问题的方式……乃得之于斯！如果在我们的“国学观念”中，将他们及其学术业绩排除在外，那将是不可理喻的。

至此，《国学大师丛书》之“国学”概念，实指：近代以降中国学术的总称。“国学大师”乃“近现代中国有学问的大宗师”之意。因之，以训诂考据为特征的“汉学”，固为国学，以探究义理心性为特征的“宋学”及兼擅汉宋者，

亦为国学（前者如康有为、章太炎、刘师培、黄侃，后者如陈寅恪、马一浮、柳诒徵）；而以中学（包括经史子集）为依傍、以西学为镜鉴，旨在会通和合建构新的学术思想体系者（如梁启超、王国维、胡适、熊十力、冯友兰、钱穆等），当为更具时代特色之国学。我们生活在90年代，当取“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国学）的观念。

《国学大师丛书》由是得之，故其“作人传、立学案”之对象的选择标准便相对宽泛。凡所学宏通中西而立术之本在我中华，并在文、史、哲任一领域开现代风气之先以及首创新型范式者皆在入选之列。所幸，此举已得到越来越多的当今学界老前辈的同情和支持。

三、一个命题：历史不会跨过我们这一代

中西文明大潮的冲撞与交融，在今天仍是巨大的历史课题。如今，我们这一代学人业已开始自己的学术历程，经过80年代的改革开放和规模空前的学术文化积累（其表征为：各式样的丛书大量问世，以及纷至沓来名目繁多的学术热点的出现），应当说，我们这代学人无论就学术视野，抑或就学术环境而言，都是前輩学子所无法企及的。但平心而论，我们的学术功底尚远不足以承担时代所赋予的重任。我们仍往往陷于眼花缭乱的被动选择和迫不及待的学术功利之中难以自拔，而对自己真正的学术道路则缺乏明确的认识和了悟。我们至今尚未创建出无愧于时代的学术成就。基于此，《国学大师丛书》的组编者以为，我们有必要先“回到近现代”——回到首先亲历中西文化急剧冲撞而又作出了创造性反应的第三代百家诸子那里去！

经过一段时间的困惑与浮躁，我们也该着实潜下心来，去重新了解和领悟这一代宗师的学术生涯、为学风范和人生及心灵历程（大师们以其独特的理智灵感对自身际遇作出反应的阅历），全面评价和把握他们的学术成就及其传承脉络。唯其贯通近代诸子，我们这代学人方能于曙色熹微之中，认清中华学术的发展道路，了悟世界文化的大趋势，从而真正找到自己的学术位置。我们应当深信，历史是不会跨过我们这一代的，90年代的学人必定会有自己的学术建树。

我们将在温情与敬意中汲取，从和合与扬弃中把握，于沉潜与深思中奋起，去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这便是组织编辑《国学大师丛书》的出版宗旨。当我们这代学人站在前辈学术巨子们肩上的时候，便可望伸开双臂去拥抱那即将到来的中华学术新时代！

钱宏（执笔）

1991年春初稿

1992年春修定

008



梁启超
评传

序

戴 逸

当吴廷嘉同志把她的新作《梁启超评传》放在我的书桌上时，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以及怎样完成了这部新作，因为近几年来，她家庭不幸，与她相爱至深的沈大德同志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她自己又病魔缠身，经常住在医院里，去年即住院三次，时间达八个月，医院甚至发出了病危的通知，身体上和精神上承受了巨大的打击和磨难，已心力交瘁。在这种情况下能够从病床上爬起来，恢复健康，就很不容易了。谁会料想到：短短时间内，她又完成了这部学术专著，真可谓“生命之奇迹”。在她身上似乎有一股永不枯竭的活力，有一颗永不会被征服的心灵。

吴廷嘉就是这样一个人。开朗、达观、活跃，坚强执着的个性，天真无邪的童心，充沛旺盛的精力，诚恳炽烈的热情，对人坦率真挚，可与深谈，可共患难；对事业和学问，孜孜追求，坚持不懈。她富有思考和论辩的才华，很早以前，我曾听过她在数万人大会上的一次公开辩论，舌战群英，滔滔雄辩，真有千军辟易之慨。她不知疲倦地工作，想要做和正在做的事情多得不可胜计，除了搞研究、写文章之外，又要扶植某个社会团体，支持某种高雅艺术，组织某个讨论会、研究会，或者苦心筹划，为边远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献计献策，



或者千里奔波，为某个地区的旅游文化进行调查和规划。小而至于帮助同志，抚养和教育孩子；调解家庭纠纷；带着温馨的心，风尘仆仆去看望和慰问在外地遭遇不幸的朋友。我每次见到她，总要劝她保重身体，缩短战线，严格控制活动的范围，有时提高声音，表现了我的忧虑和责备。她总是笑笑，好像理解了我的规劝但又无可奈何地委婉拒绝。追求事业，帮助别人是她人生中的最大乐趣，她永远在无休止地奔波、忙碌，却无暇休息几天，将养自己的身体、照料自己的家庭。她富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又极其珍视友谊，为别人考虑、做事，把生命奉献给别人而对自己却少有顾惜。

只要稍稍翻阅此书，就会知道吴廷嘉写作此书花费了多少时间，投入了多大的才思和精力。尤其是她病躯怯弱、事务冗忙之余，真是用自己的心血滴写了这部学术新著。梁启超是近代中国的杰出人物，政治上推进变法维新，开辟一代新风，学术上涉足多种学科，构建近代学术理论的体系，成为当时知识界的启蒙大师和精神领袖。梁启超一生的著述丰富，《饮冰室合集》，皇皇巨著，篇幅浩瀚，而要深入研究他的学术活动和学术成就，更需要广博的知识和各方面的深湛修养。过去，学术界研究梁启超都注重他的政治活动和宣传工作，对学术方面并无系统的专著。而且，梁启超在政治上也曾遭到不公正的贬抑，这也不能不影响对他学术成就的评价。吴廷嘉有鉴于此，发大宏愿，奋大毅力，决定撰写此书。她很早以前，曾经精心钻研过《饮冰室合集》，也深入探讨过康有为、谭嗣同、章太炎、王国维等人的思想。积累甚丰，酝酿已久，故发之也疾。加上她才思敏捷，勤奋努力，在病体稍痊之后能够迅速而高质量地完成这部新作，为学术界填补了重要的空白。这也许就是我刚刚看到书稿，感到惊讶而不解的原因。

吴廷嘉的《梁启超评传》，以时序为经，以学科为纬，系统地研究了传主的全部学术活动。梁启超生活在封建社会走向近代的过渡时期。他的学术具有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和性质。梁的古学极有根柢，故而是传统学术当之无愧的继承者、负荷者，又如饥似渴地学习和吸取西学，勇于进取，开拓新知，故能成为中国近代学术的奠基人。他的研究范围极为广泛，最有成就的当推历史学、思想史、历史研究法，旁及政治学、经济学、财政学、法学、新

闻学、教育学、佛学、诸子学、目录学、文艺、诗歌小说等等。他的学术精髓在于继旧开新，沟通中西，为近代学术奠筑基石，其筚路蓝缕之功，不可泯没，而草创伊始，大辂椎轮，涉猎广泛，难期折中至当，故不免有浅尝辄止之嫌。

吴廷嘉一方面以历史学家的冷静和严峻态度，剖析梁启超的学术活动，区分其精华和糟粕，指出其成就和局限，另一方面又全身心投入研究，不仅用理智去思索，而且用感情去体验，故而行文跌宕生姿，笔锋常挟风雷。她高度评价和讴歌梁启超的学术贡献，对这位政治上和学术上的巨人一赞三叹，充满崇敬之情。她把梁启超放在大的时代背景中，作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既怀抱爱国救民、淑世济人的情怀，矢志不渝，百折不回，又受时代的局限，徘徊踯躅、惆怅迷惘、上下求索、随时流变。吴廷嘉既用科学的态度去观察他、分析他，又用心灵和感情去接近他、理解他。应该说，这样做是非常必要的。

当前，文化研究仍是社会的热点。梁启超在研究传统文化，尤其是撷取古代文化精华，创造性地构筑近代学术殿堂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成绩。他的著作、学说理应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牛顿说过：由于他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故能取得物理学上的光辉成就。我国也有自己的文化巨人，梁启超就是其中的一位。我们应当继承他的思想遗产，去创造新时代的学术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吴廷嘉的研究工作十分重要。她大病初愈，不辞劳瘁，全力以赴，锲而不舍，给学术界带来可贵的成果。我怀着感谢和敬佩之心，读完了她用心血滴写成的这部著作，写下了这篇序言。

PRÉCIS

(英文提要)

This book, which took the whole learning pursuit of Liang Qichao as longitude and his accomplishment as latitude, made a systematic study on the developing process of his learning pursuit and several main stages and the cause of their turning, analysed his learning origins, the relations between his teachers or friends and him, the method of his study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the social significance of his accomplishment. The authors of this book, pointed out that Liang Qichao is a great enlighten scholar, and he had made a serious influence on the traditional learning of China, applying western advanced social theories and methods in the light of morden China's specific conditions and the needs of the times. On this basis, he had set up the social science theory of morden China as a system. So he not only had been the first man of a lot of new science, such as bourgeois history, political science, financial science, pedagogy, literary theory and so on, but been the spirit leader of the intelligentsia of morden China. For a long time past, the research on Liang's accomplishment had been lack and

the appraisement too low,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mistaken political rule. Now, it's a duty of the intelligentsia of China that we should straighten out Liang's learning legacy renew and carry forward his spirit.

002



梁启超
评传